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
与文化认同

当

代 文 学 文 化 研 究 书 系

孟繁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书系

90132582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
与文化认同

孟繁华 著

AL325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孟繁华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28-3932-X

I. 传... II. 孟... III. 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451 号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孟繁华 著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2092663 传真: (0531)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8.75 印张

字 数: 199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3932-X

定 价: 14.5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理事会

顾 问：吴阶平

名誉理事长：赵志浩 宋木文 吴爱英 柳 斌

董凤基 杨牧之 邬书林 滕昭庆

车吉心 张小影 吴尚之

理 事 长：高挺先 宫本欣

副 理 事 长：(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卓明 刘廷奎 孙永大 张士保

张立升 陈光华 陈学振 钟永诚

常务副理事长：孙永大

秘 书 长：赵 猛

副 秘 书 长：咎 亮

理 事：王世农 王卓明 王洪信 刘廷奎

孙永大 杜希福 杨文辉 李华文

李建军 张士保 张立升 张华纲

陈光华 陈学振 陈 钟 邹 健

赵 猛 钟永诚 咎 亮 宫本欣

曹宏遂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书稿评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任继愈	刘国正	吴文俊	季羨林
委 员：	于 漪	王炳照	王富仁	刘知新
	刘祚昌	齐 涛	孙永大	邹 健
	张双棣	张志勇	张恭庆	陆俭明
	周玉仁	周振鹤	赵彦修	胡壮麟
	侯明君	袁行霈	顾明远	顾振彪
	郭齐家	崔 峦	阎金铎	彭实戈
	彭聃龄	蒋绍愚	裘锡圭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 转折	[020]
一、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 形象	[020]
1. 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与实践	[022]
2. 现代化诉求中的社会主义激情	[026]
3. 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029]
二、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 建构	[037]
1. 传奇形式中的民族性建构	[041]

2. 献身理想的诗性叙事	[045]
3. 现实关系中的“阶级敌人”	[049]
三、“积极教育”与“消极教育”	[052]
1. 大学教育中的“领导权意志”	[054]
2. 知识界对“文化领导权”的认同方式	[061]
3. “消极教育”的两种叙事	[070]
四、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076]
1. 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	[078]
2. 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	[088]
第二章 传媒的“一体化”控制	[100]
一、报刊制度与文化同质化	[102]
1. 东、西方报刊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102]
2. 文学报刊与文化同质化	[107]
二、中国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政治想象	[111]
三、戏剧的“现代”转换	[120]
1. 面对传统、民间的矛盾和处理的困境	[121]
2. “传统之死”	[126]
四、编辑部的困惑	[132]
1. 《文艺报》的迁动与斗争	[134]
2. 主编“精神”与社会地位的陷落	[138]
第三章 传媒时代与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145]
一、传媒的发展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冲突	[151]
1. 苍白与丰艳的矛盾	[151]
2. 强势文化与民族性的冲突	[155]
3. 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冲突	[157]
4. 网络文化与传统媒体的关系	[159]
二、传媒战争与传媒功能的转变	[162]

1. 期刊体制的解体与改刊风潮	[162]
2. 传媒大战与功能的转变	[166]
三、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173]
1. 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	[173]
2. 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176]
3. “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184]
四、电视的文化领导权	[193]
1. 明星及其“共谋者”	[196]
2. 广告与生活政治	[205]
五、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	[210]
1. 社会分化与新阶层的形成	[210]
2.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216]
六、游牧文化与网络乌托邦	[222]
1. 游牧文化与网络政治	[226]
2. 网络文学	[232]
第四章 传媒帝国主义批判	[249]
一、传媒的文化霸权	[249]
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256]
参考书目	[269]
后记	[273]

绪 论

现代传媒的发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话,无所不能的现代技术和光怪陆离的资讯及想象的合谋,使传媒的整体形象正趋于“人妖之间”。一方面,它几乎无处不在地填充着日常生活,以尽其所能的方式为所有的人提供“满足”和欲望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仅仅是看得见的可供选择的视觉符号;一方面,也正是这些貌似“亲和”的符号,“不为人知”地改变和控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因此,传媒研究成为当下

学界的一门显学,就不应将其看做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时尚。这个由印刷和电子符号构成的幻觉世界,使人们产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换的虚幻感,在传媒中构成的那个世界不断地闪灭,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现代“故事”,就像街头广告一样,它若隐若现但并不属于你,同时,我们在传媒不间断的宣谕中又时常体验着快乐和需要。传媒带来的失落和满足,背后隐含的也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复杂心态。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和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

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 hegemony 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外围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像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

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

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疾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文化领导权显然已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有别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但支配着物质生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又在不断的强制推行中,试图抹去它的“虚假意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

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

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只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zzarone（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

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60年之后的世界图像,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

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9]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